

热点
评论

杭州警方近日发布通报,发现在当地银行的近亿元存款失踪案告破。该案涉及42名储户存在杭州联合银行总计9505万元的存款,案发于2014年年初,警方经过近一年时间,先后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被盗”存款追回5000多万元,其余4000多万元银行已先行支付给储户。

把钱存在银行,是一种传统的行为,也是最安全的理财方式。然而,近期接二连三曝光的银行存款失踪案,正在挑战人们的固有理念,也让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产生动摇。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存款失踪案件中,上市公司泸州老窖算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唯

银行存款失踪不该成悬案

一的法人,其他受害者基本都是普通储户。1月9日,泸州老窖公告表示,其存在河南南阳等地工行的共计3.5亿元银行存款存在异常,加上去年10月发现的1.5亿元存款失踪,短短3个月内,泸州老窖总计5亿元存款出现异常情况。

存款失踪案件近年来不时发生,但能抓获罪犯、追回赃款且完整披露案情的,并不多见。杭州警方此次在破案的同时,比较全面地通报了案发经过和细节,有助公众防范风险。杭州亿元存款失踪案中的42名储户是幸运的,警方破了案且追回了存款,他们的损失应该不会太大。相比之下,有些受害人就没什么走了,由于涉案存款无法追回,而银行又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拒绝赔偿储户损失,最终导致案件

成为悬案。

究其原因,首先是相关法律法规存在漏洞,让银行有了推卸责任的可乘之机;其次是我国法律的举证原则不利于处于弱势的储户维权。《商业银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挪用、侵占本行或者客户资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部法律对于商业银行此情形下,应承担什么责任未予明确表述。只惩罚“雇员”,不追责

“雇主”,相关法律给出如此优待,难怪银行可以将存款失踪的责任切割得干干净净。另外,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法院往往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人单力薄”的储户想要证明银行有罪、自己无辜,谈何容易。这也是存款失踪屡成悬案的重要原因。

从制度层面看,央行、银监会是商业银行的监管者,但在公众眼中,他们疑似“一家人”。我国相关法规对银行的“保护”如此贴心,对储户利益的保障却有诸多无视,其中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痕迹明显。部门利益的樊篱要破除,法规的漏洞要弥补,这样才能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才能及时堵住银行的漏洞,让公众的血汗钱、保命钱免于无辜“清零”。

焦点
话题

福建一名5岁女童毛毛(化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福建省卫计委医政处处长杨国红却表示,根据相关法规,对于输注“窗口期”血液引起的HIV感染,血站和医疗机构并不存在过错行为。

“无过错”是个很容易点燃情绪的词,不少人追问:无过错,这小女孩的艾滋病是从哪来的?无过错,污染的血是怎么通过一道道关口流入一个小女孩身体的?难道过错在她自己,不该治病,不该输血,或者干脆说不该去那家医院?

这种诘问不能说没道理,但它也可能忽视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在这起事件上,的确可能是大家都无过错的,血液中心照理应该对血的质量负责,可是由于在“窗口期”检测不出抗体,他们也不存在主观上的错误,而医院用的都是血液中心提供的血,似乎也很无辜。

小女孩的遭遇值得所有人同情,但一定要把责任归咎到某个人某个机构身上恐怕也有失公允。“窗口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我们对疾病的认识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也是客观事实。我们有要求医护人员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每一个手术每一个环节的权利,但我们却没有要求医生必须治愈百病的权利。有关法规对于“输注‘窗口期’血液引起的HIV感染,血站和医疗机构不存在过错”的规定既是在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也是在保护医疗秩序。我们应该看到医学的局限性、看到医生这个职业的局限性。用法律和责任来捆绑医生医德,是为了明晰责任权利的界线,而不是为了捆住医生的手脚。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我们任由这样的事发生?“窗口期”是客观存在,那岂不是意味着每一个要输血的人都有可能面临这样的风险?他们一个个都无过错,那我们凭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我们又到哪里寻找安全感呢?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是到医院输血的时候被感染的,血是血液中心提供的,女孩家人缴了医疗费,把生命和信任托付给医疗体系,她们并没有做有损他人利益的事,现在出了事,怎么能说你没过错,没有责任呢?

所谓的“无过错”只是技术层面上的,“窗口期”也许无法测出艾滋病毒抗体,但通过核酸检测还是能检出病毒感染的,我们都理解一些高精尖技术不可能大范围普及,我们也不可能把国家级的实验室搬到每一个血站去,医疗条件的不足受限于整个时代。法律能免去他们的法律责任,但免不了他们道义上的责任,也免不了在制度上设计好这种风险赔偿机制的责任。

简单地说,既然你也知道这里面存在风险,那就没有理由让患者来独自承担风险。以人为本不仅是针对医生的,同时也是针对患者的。

输血染艾『无过错』不代表无责任

不能再坐视人口结构失衡

民生
视角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0日披露,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以女性为100),而正常的男女人口比例一般在102-107之间。不少网民感叹:男同胞压力好大。

透过人口数量表象,我看到两个问题:性别结构失调,年龄结构失衡。前者主要体现在男女比例溢出正常值上,它意味着不少男性将沦为“光棍”。而家庭细胞一旦出了问题,必然导致社会不健康。

有人可能会说,不对吧,我怎么觉得“剩女”比“剩男”多呢?其实这不过是发声多寡的问题:剩女往往文化程度较高,多能熟练运用网络等途径表达“剩女情结”;而剩男则多生活在落后乡村,连上网机会都没有。从另一个角度看,剩女往往是主动的“剩”,而剩男多是被动的“剩”,他们亮身份的机会也少。

再拿年龄结构来说,依照国际上对老龄化的判定标准,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已非常严重。老龄化来袭,社会养老议题也愈发受关注。但别忘了,

社会养老不过是家庭养老的社会化合作。缺少了年轻人,社会养老如何能持续?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还会导致“用工荒”愈演愈烈。有人说,不对吧,我听到更多的怎么是“就业难”,而不是“用工荒”呢?这与对“剩女”和“剩男”的错觉一样:感到就业难的多是大学生,未就业的大学生及其家人的和声共鸣;感到用工荒的则主要是企业,它们对人口红利消减的呼应,多体现在行动上,如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或是外迁。而科技进步,也不等于整个社会劳动力需求会减少,只是劳动力在各产业的分布发生变化: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增加,会对其他产业的需求萎缩。

人口数量只是表象,人口结构才是根本。如果只为控制人口数量,而破坏了人口结构,那跟“但管人直莫管人死”的治临庸医没什么两样。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办法是根据生育率过低的人口“新常态”,进行生育政策联动调整,甚至适时放开自主生育,并适时出台鼓励生育和严格选择性别堕胎等措施。当那些夫妇可通过再生育而不是选择性别堕胎来实现自己的生儿或生女愿望,社会劳动力会得到相应补充,养老问题也更有依托。尽管人口结构不会立即得到优化,但至少会让人看到优化的希望。

□杨宇实



社会
透析

用公示堵住“发明专利减刑”漏洞

在某些监狱,服刑人员在狱中获得发明专利,可以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予以减刑。原足协副主席南勇等多人均因此获得减刑。记者调查暗访多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发现,部分机构在其网站上明确标明为监狱服刑人员提供发明申请专利减刑服务,内容包括为其量身定制发明成果。(1月19日北京青年报)

“发明专利减刑服务”能够有市场,在于发明专利确实可以减少监狱服刑人员的刑期。我国《刑法》规定,“罪犯在执行期间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刑。

监狱服刑人员据此潜心于发明创造,并无不妥之处。但问题是,一些服刑人员与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勾结,玩起了购买发明专利、假立功减刑的猫腻。这既违反了法律法规,也容易诱发监狱、法院等司法部门工作人员“权钱交易”等违法行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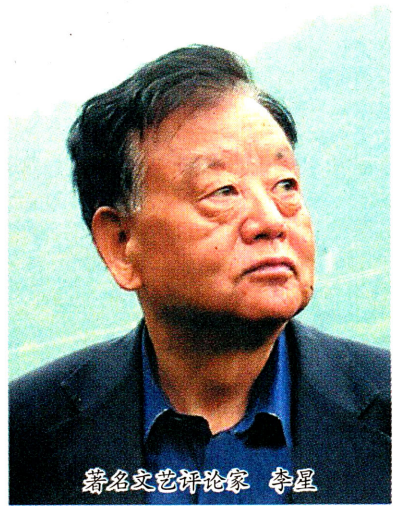
几年,司法人员在“减刑”方面屡有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就是例证。

“发明专利减刑”之所以会出现“量身定制”、“买卖专利”等乱象,原因一来在于法律法规对服刑人员发明专利的评估和认定,尚没有统一的规定;二来在于一些地方的监狱和法院等司法机关,在服刑人员减刑方面缺少应有的公开透明,客观上为某些人的违法违规行提供了操作空间。

因此,消除“发明专利减刑服务公开叫卖”等乱象,既需要对《刑法》关于“发明专利减刑”的规定予以细化,明确具体实施标准,更需要守住公开透明的底线,用公示堵住“发明专利减刑”漏洞。其实,办法早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上述《规定》明确,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公示,重大立功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六类案件必须公开审理。如果各地司法机关能够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公示,对重大立功案件进行公开审理,自然能够防止违法违规行为。而要让司法机关做到这一点,除了要从制度上保证其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外,还需要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不让不法分子有丝毫可以违法违规的操作空间。

□宋广玉

精神到处文章老



著名文艺评论家 李星

李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他一生为人作嫁衣,写下大量评论性文章,尤其是小说评论。厚厚三卷本的《李星文集》可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一次大集中、大梳理、大检阅。对于小说我没有发言权,我注意到的是在那数量巨大的小说评论中居然还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这一意外发现着实让我高兴。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在所有文体中散文是最贴近心灵的一种文体,散文不同于小说的虚构、诗歌的浪漫,它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才情胆略、德识修养。一篇散文,哪怕它只有几百个字,也能表达出一个人的真功夫,即个人学养和人格境界的高下。

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我仔细阅读了李星的散文《我的优胜纪录》。读后的第一感受是:这是一篇浓缩了诸多人生经历与体验的生命之作,不是文字,而是心血。“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我最喜欢的句古诗,不想竟在李星这里找到了知音。仅凭这个开头我就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接下来的这篇文章绝对是一篇人生感悟之作。果不其然,作者很快就引了那首著名的《公无渡河》,不同的是他赋予了它新意:“我说你不要到世上来,你偏要到世上来。焦头烂额而死,我又有什么办法!”这一接近戏虐式

的诠释竟有一种类似于“含泪的微笑”般的出奇效果,让人在一笑之余痛感人生的荒谬,从而对人生发出一种“同情的理解”或“理解的理解”。

接下来,李星紧紧围绕“优胜纪录”这一主题,从生命的胜利者、人生的胜利者、专业的胜利者等十个方面全面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并最终得出自己是生命、生活、人生的胜利者这一结论。叙述中作者不溢美、不隐恶,甚至不惜将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些阴暗的东西挖出来。这说明,作者敢于直面自己,剖析自己,有一种深深的反省与良知。林非先生说过:“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在于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正是作者的这种掏心挖肺式的坦率和真诚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每一位阅读它的读者。

《我的优胜纪录》通篇采用的是叙述和白描,很少用到抒情手法。然而却具有吸引人心的强大力量。这篇文章给我们的启示是:散文写作不见得一定要讲究什么技巧、技法,你只需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原原本本地讲出来即可。最朴素的真实往往最能打动人心。

散文创作不一定需要数量众多。真正好的散文,一篇就足以立身。譬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胡适的《追悼志摩》、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当然也包括这篇《我的优胜纪录》。

李星先生对我讲,《我的优胜纪录》一文是他应四川一家出版社的征文而写的“调侃”之作。那次征文要求就是要用“调侃”的口气来写人生。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篇不经意的为文之“调侃”之作却足以让李星进入当代散文家之列。很简单,这是因为这篇散文是作者积一生之经验而为。调动起一生的生存积淀、用一生的智慧去写一篇文章,怎么可能写不好呢?这正好印证了古人的一句话:学问深时意气平,精神到处文章老。

□史飞翔

佳作推荐

不知是谁最先使用了“书香”一词,用得真是好极了。书的世界就该纸墨飘香,仿佛予人玫瑰之手,芬芳犹存。我猜想,旧时所谓“敬惜字纸”之说,当也源于对书本的尊崇、敬爱和珍惜。

闲暇时,我喜欢逛一逛旧书铺和旧书摊。倒不一定是像那些旧书收藏者,怀着明确的猎书、淘书的功利目的,有时纯粹只为感受一种故纸芬芳,享受一下翻阅旧书的好奇和乐趣。那些曾经出入过许多人家,因为各种原因而流落到书店和书摊的旧书,也确实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何为“手泽”。正如查尔斯·兰姆所说:一个真正的爱书人,只要他还没有因为爱洁成癖而把所有的老交情都拒之门外,那么,当他从旧书铺获得一部旧版的《汤姆·琼斯》或是《威克菲尔牧师传》的时候,无论这些书上有怎样污损的书页和残缺的封皮,它们对他仍然会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和亲切感,它们的破损也只在表明:肯定有无数位读者的拇指曾经伴随着欣悦的心情,一遍遍翻弄过这些书页;也许它还曾经给某一位贫穷的缝衣女工带来过欢乐和幻想……在这种情景下,兰姆说:“谁还会去苛求这些书页是否干干净净和一尘不染呢?”

大作家奈保尔说过这样一段话:“好的或者有价值的写作不只是一项技巧,它有赖于作家身上某种道德完整。不诚信的作家是在背叛他的职业,只有差劲的作家才会这么做。”套用一下这句话,似乎也是得当的:好的有价值的旧书买卖,不只是一项交易,它也有赖于书商的某种道德完整。过于功利的书商是在背叛他的职业,只有差劲的书商才会这么做。我所认识一位德国旧书商。他的名字叫“汉尔”(音译),每年我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时,无论多么忙碌,都会抽空到他的旧书铺里去看看他,跟他打个招呼,有时候也会请他帮我找几本想看的旧书。不知道他平时是把自己的旧书铺摆在哪里,每年十月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他就把旧书铺搬到了展场外的一个小广场上。那里集中了许多旧书铺,是一个蔚为可观的“旧书广场”。

汉尔先生的旧书铺有七八间的规模,以德语文言旧书为主。德国的精装本旧书,装帧都很古朴典雅,有的还是麻布封面或皮脊的,插图也很漂亮,有的是十分

故纸芬芳

买书绝不只是一种交易



美丽的套色版画。而且,德国的旧书品相都很大很好,我想这是因为德国的家庭藏书和喜欢读书的人,都

比较敬惜书籍,爱护书籍。汉尔先生自己就是一个十分爱惜书籍的人,他的书铺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各类旧书摆放得又美观又方便寻找和取阅。没有顾客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耐心地,专心致志地修补和整理旧书。

我去法兰克福有六七次了,每次去都会觉得,这位老先生很明显地在一年年地变老,使我隐隐感到一丝心疼。每次见到他时,他都会热情地搬来一些估计我会喜欢的书,供我挑选。我在汉尔先生那里先后买过几本歌德、席勒的精装本诗集和剧本集,买过几本布面小开本的、古雅的套色木刻画集,还买到过德国著名故事诗《顽童捣蛋记》的一个较好的插图本,后来我在出版绿原先生翻译的这一小册故事诗时,正好解决了原插图问题。汉尔先生知道我喜爱歌德,还特意帮我找到了一幅好像印刷在绒布上似的、年代久远的歌德画像。回国后我托朋友给这幅歌德画像装了一个雅致的木框,挂在书房里,天天可以面对。

每当看到这幅歌德画像,我就会想起年老的汉尔先生。我很怀念这位友善的旧书商,祝愿这位善良敬业的老人健康长寿。

60年前(1952年),一代大藏书家周叔弼先生将他数十年精心收藏的715种、2672册珍贵善本古籍无偿捐赠给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其中多有宋元珍版和明清善本。我翁藏书室名“自庄严”,取佛经“佛庄严,我庄严”之意,并治有“自庄严”印。又因曾收得宋本《寒山子诗集》,特治“寒在堂”印;因收得两部元版《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又各取书首字治“东稼草堂”印;因所藏宋蜀本《王摩诃文集》中有“山中一半雨”句,故治“半雨楼”印。1942年,因家用不足,叔弼老人曾忍痛将明版书一百余种,易款度日。去书之日,心中依依不舍,特作书曰《壬午鬻书记》纪念。不久,他听说宋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礼记》在天津求售,见其刻印精美,恐失之交臂,又赶紧用易书之资买下,自谓“卖书买书,其情可悯”;“贱书一乐,故友重逢,其情弥亲也。”此亦旧书收藏的古道高风吧。

摘自徐鲁《茶烟起淡淡》

书海撷英